

关注历史和政治的美国后现代派作家

E. L. 多克托罗

杨仁敬

摘要: E. L. 多克托罗是美国著名的后现代派小说家,他对历史和政治的关注表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小说里巧妙地将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融为一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有助于读者了解 20 世纪末美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新变化。

关键词: 关注;历史;政治;多克托罗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5529(2001)05-0003-05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 1961 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问世至 70 年代初为 20 世纪前期后现代派小说,自 1971 年出版《但以理书》至 90 年代末为 20 世纪后期后现代派小说。前期涌现了许多黑色幽默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后期也有不少引人注目的小说家,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就是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简称为 E. L. 多克托罗。

与其他美国后现代派作家相比,多克托罗不仅具有后现代派小说家的共同特点,而且个人风格独特,突出表现在他对美国现代历史的关注和对权力政治的抨击。有人称他是个“激进的犹太人文主义者”。他以此为荣,并曾对一位访问者说:“如果我不属于这个传统,我一定要申请加入它。”

这是与他的亲身经历分不开的。

E. L. 多克托罗 1931 年 1 月 6 日生于纽约市。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他自称是个中下层的文化世家,具有社会主义意识。他祖父开过印刷厂,爱玩国际象棋,是个有文

化的无神论者,信仰社会主义。家里的书架经常摆满名作家的著作,如杰克·伦敦的《铁蹄》和《阶级之战》、不可知论者罗伯特·英格索尔(Robert Ingersoll)对《圣经》的评著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哲学和心理学专著。多克托罗记得他 10 岁或 11 岁时,祖父曾向他推荐美国政治哲学家汤姆·品恩的《理性的时代》。后来,他父亲在曼哈顿区开了一家小店,出售收音机和乐器,但在大萧条期间倒闭,他只好去当家用电器推销员,勉强糊口,全家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1948 年, E. L. 多克托罗从布朗克斯中学毕业后考取俄亥俄州的肯尼恩学院,想跟著名的诗人和新批评派的主将 J. C. 兰塞姆学习。但他主修的是哲学,而不是英文写作。他积极参加校园的戏剧活动,而不是练习文学创作。1952 年毕业后,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英国戏剧。1953 年至 1955 年,他参加美国军队被派到德国服役。退伍后,他本可以回去继续研究生学习,但家庭经济困难,他便设法自谋出路,打过杂工,到纽约一些影视公司当编辑,看剧本,一天看一本,每周 7

天,看看它是否适合改编为电影或电视。1959 年经朋友介绍,他到新美洲图书馆任助理编辑。4 年后,他升任戴尔出版公司的总编辑,后任副总裁,直到 1969 年。这时,他收入日趋稳定,生活安定,开始搞业余创作。1968 年他去萨拉·劳伦斯学院任教,边讲课,边写作。后来,他还去加州大学厄恩分校、犹太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等校担任客座教授。目前,他在纽约大学给研究生讲授文学写作课。

1960 年,多克托罗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欢迎来到哈德泰姆斯镇来》,描写一个外来的坏人几乎毁灭了达科他州小镇哈德泰姆斯。小说吸引了不少读者,还卖给好莱坞拍电影。但第二部长篇小说《大如生活》直到 1966 年才问世。它描写纽约出现比帝国大厦还高的裸体巨人,使市民感到恐慌和不安。但作者对科幻小说的尝试令人失望。

1971 年,多克托罗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但以理书》出版。翌年,该书荣获古根海姆奖,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作者选择 50 年代初轰动全球的罗森堡夫妇因所谓“间谍罪”被处死的真实政治事件作为全书故事的核心,引起了美国广大读者的共鸣。它仿佛是 60 年代美国社会的缩影,巧妙地展示了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迫使大批青年去当炮灰,草菅人命,专断独行的弊病。60 年代末期正是越南战争造成美国社会矛盾激化,民众愤怒,激进的少数人带动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时期。多克托罗重访历史,以史喻今,触动了读者的心,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民众的呼声。因此,多克托罗被誉为位全国最有想象力的杰出的作家。

《但以理书》的书名借用了《圣经·旧约》里的《但以理书》。小说的背景在 1976 年。一个名叫但以理的青年人,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沉思,表面上他在写博士论文,实际上他在思考生活的意义。他怀念死去的双亲伊索尔和朱立叶·罗森堡。他喜爱他漂亮的妻子和儿子,尽力想了解他姐姐激进和发

疯的原因,调查他父母被处死的来龙去脉。从他父母的不幸遭遇中,他发觉美国正在毁灭它自己和它的人民。但他抱着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与美国现实妥协,如同千千万万同代人一样。多克托罗强调人类的大敌来自其自身的异化。社会的变态、心理的扭曲和信仰的危机折磨着但以理。小说将历史的真实和虚构的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实地展现了 60 年代美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描述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和抗争。作者采用拼贴法,将真实的照片和虚构的画面组成一部多姿多彩的画卷。罗森堡夫妇受电刑的细节写得细致入微,绘声绘色,分外逼真,揭露了政府当局的冷酷无情和决策失误,陷害无辜的科学家。小说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多克托罗对历史和政治的关注,深受读者和学者的赞赏。《但以理书》被誉为部美国当代最佳的政治小说、现代的经典小说。

《但以理书》的成功使多克托罗找到了自己的感觉,越写越出色,正如著名的评论家詹姆斯教授所说的,多克托罗“小说越写越好,影响越来越大”。1975 年问世的《拉格泰姆时代》第二年荣获全国图书奖,1985 年发表的《世界博览会》和 1989 年出版的《比利·巴思格特》也分别获得 1986 年和 1990 年全国图书奖。这 3 次全国图书奖的获得,使多克托罗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从美国文坛升起,成为当代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拉格泰姆时代》使史实和虚构达到更完美的结合,展现了美国小说的新模式,虽引起争议,但好评如潮。作者选择一种 20 世纪初期,尤其是第一次大战前盛行的黑人音乐来代表这个时代。这种音乐常常是演奏者以右手弹奏变化多端的切分音,左手以稳重的低音伴奏。小说虚构了犹太移民、穷黑人和生活安逸的白人三个家庭,又引进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企业家亨利·福特、J. P. 摩根、艾玛·高尔德曼等真人真事,构成了不同的社会层次,使他们仿佛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群体里。作者采用了断裂式的叙事话语、互不相关的

短语或省略句,给人一种像切分音节拍的跳跃感。小说以亦真亦幻的艺术手法揭示了美国工业化大变革时期市场的繁荣、移民的涌入、劳资的矛盾、贫民窟的困境和种族的冲突等等。《拉格泰姆时代》成了多克托罗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1980年,多克托罗将注意力转向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社会,相继发表了3部长篇小说《鱼鹰湖》(1980)、《世界博览会》(1985)和《比利·巴思格特》(1989)。它们以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艺术手法获得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这些小说如今已进入美国许多大学的课堂,成了研究生的重要读物。多克托罗的其他作品还有:剧本《晚餐前的饮料》(1978)、短篇小说集《诗人的生活》(1984)、评论集《1977-1992年论文选:杰克·伦敦、海明威与宪法》、长篇小说《滚滚流水》(1994)和新的长篇小说《上帝的城市》(2000)等。

30年代大萧条时期是20世纪美国很重要的历史时期,为许多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纳珊尼尔·韦斯特的《蝗灾之日》、辛克莱·路易斯的《这里不会出事》和麦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等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30年代美国的社会生活,具有非凡的意义。但多克托罗独辟蹊径,用青少年的遭遇来展现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令人耳目一新。

《鱼鹰湖》描写主人公帕特森在大萧条年代里离家外出寻找生活出路的故事。他是新泽西州一个热情奔放的青年。一个寒冷的晚上,他到了阿德隆代克山里,梦见一幅跟他自己生活截然不同的画面。它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迷茫地跟着一列私人火车跑到鱼鹰湖,在那里看到一群人:一个诗人、一个匪徒、一个大富商和一个绝代佳人……他和他们的故事是那么令人难忘。“鱼鹰湖”像一面镜子,映出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给人留下无限的启示。作者交替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运用拼贴法,将许多生动的碎

片串成多色调的画面,并且打破体裁的界限,使散文和诗歌融为一体,交相映辉,充满诗情画意。

《世界博览会》连续3个多月在《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榜上有名。它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记述了男孩艾德加30年代在纽约市的生活故事,很像一部真实的回忆录。作者巧妙地再现了当时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和曼哈顿区的景色、声音和风土人情,展示了许多穷苦人家同甘共苦、一起度过了经济危机的艰难岁月。艾德加抱着苦乐参半的希望去参观1939年世界博览会,想从中找到生活的启迪,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的身上体现了纽约市丰富多采的文化习俗。小说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描绘了艾德加对童年的反思。许多真实的细节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如艾德加爱读书,每周六上午常步行去离家很远的图书馆借书。纽约世界博览会公司就在那个图书馆举办少年征文比赛,题目是“地道的美国男孩”,限写250字左右,并附上签名的照片。他想参加,向图书馆员借了纸和笔,记下比赛的规则。他家太穷,进不了博览会参观。可是,在回家的途中,他竟被两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男孩持刀抢走了他身上仅有的12美分,还骂他“犹太佬!”

《比利·巴思格特》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揭露了30年代大萧条时期黑社会头目与官场的勾结和冲突、黑社会内部的相互残杀和对老百姓的掠夺。这些社会渣滓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重新泛起,作恶多端,危害人民,危害社会。作者对这些社会丑恶的抨击深刻有力,爱憎分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警匪之战是通俗小说的常见题材,作者将它写成一部“现代经典之作”,的确身手不凡。比利·巴思格特是个纯真的男孩,早年其父出走,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清贫。15岁那年的一天,他给孩子们表演杂耍,被苏尔兹黑帮一伙看中,招募他入伙,从此步入罪恶的世界。他在海上船舱和城市酒店的杀人现场经历了血的“教育”,在奥农多加深山之行中又与杜小

姐发生了浪漫插曲。末了,匪首苏尔兹死了,巴思格特侥幸地获得黑帮的巨额财富。他在文明社会中变成一个大款,和母亲推着他与杜小姐所生的儿子,在故居的大街上漫步……比利·巴思格特从黑道冒险中闯出来了,成功了。金钱成了文明世界与黑帮世界的桥梁。敲诈与贿赂,审判与通缉在金钱面前成了同义词,两个世界在金钱的捏合下几乎失去了应有的界限。

《比利·巴思格特》以天真少年的眼光作为叙事视角,描写了以苏尔兹为首的纽约黑帮的犯罪内幕,独具艺术魅力。作者吸取哥特式小说的手法营造气氛,效果极佳。杀人场面多次出现,人头落地,鲜血滚滚。小说开头采用倒叙的电影艺术手段,使故事悬念丛生,戏剧性浓烈。漆黑的夜晚,苏尔兹派人用小船载着被手铐铐紧的波·威恩伯格出海,准备悄悄地将他抛入大海淹死,以便将他的女友杜小姐占为己有。天真的比利站在甲板上,还不懂出了什么事呢!作者还用人物言行的对照,使杀人不眨眼的苏尔兹自我暴露。他手上沾满无辜者的血,却大办皈依天主教的仪式,向奥农多加入施舍几元钱,装做一个虔诚的教徒。这正是斯威夫特、果戈理等一些艺术大师常用的讽刺手法。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比利·巴思格特》也是很有特色的。作者将许多精彩的画面一片片拼贴起来,使惊险和暴力场面与沉着的叙述和抒情描写统一起来,有张有弛,节奏紧凑,扣人心弦,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因此,《比利·巴思格特》不仅是多克托罗的最佳作品,而且成了 80 年代末以来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曾连续 3 个月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金榜。1990 年,它荣获全国图书奖和福克纳文学奖,并已被译成 20 多种语言。《时代》周刊推荐它为 80 年代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它在美国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多克托罗对于后现代派小说技巧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仍忠于欧美

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注意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的联系。这是他从亲身经历中作出的合理选择。他说:“作家与历史不搭界的地方就是天堂,什么事也不发生的天堂。”他回忆 1946 年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鼓吹“冷战”谈到“铁幕”时,他还是个中学生。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时,他刚好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他,而且几乎所有今天还在写作的美国作家都是在“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冷战”构建了美国的文化生活几乎达半个世纪。“冷战”思维影响了文化模式。在文学领域几乎只有一代人还活着。他们已经接近或达到 70 岁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完全受“冷战”思维所支配。但他们带有“冷战”时代的心理创伤。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将美国拖入“合法迫害”的黑暗时代,无罪人要宣誓忠于政府,一大批知识分子上了黑名单,美国青年敢怒不敢言,《时代》周刊称他们是“沉默的一代”,其实他们内心备受压抑,十分苦闷。“冷战”时代出现核军备竞赛,爆发了两次非核的常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越南战争夺去了 5 万多名美国青年的生命,成了“冷战”时代最荒唐的表现,激起了青年学生一代的反抗,使他们对僵硬的传统价值观提出挑战。民权运动遍及全国,美国出现了 19 世纪南北战争以来最可悲的分裂。越南战争后,幸存者回国发觉自己可以过着不受干扰的生活。他们的子女变得驯服、肯干和开心。而政府则把“冷战”的大量开支民主地转嫁于各阶层的人们身上,除了最有钱的人以外。结果,全国的生活水准下降了。因此,作家在创作时不得不考虑这半个世纪的“冷战”所造成的社会的变态和文化的病态。

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多克托罗在《作家的信仰》(1985)一文中提到:除了某些作家以外,美国作家对艺术的社会价值不太热情,因此,比较不会产生意识危机。回顾 30 年代,每个人似乎都想到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但后来人们误把这个时期当成浪费艺术精力的

时代,知识分子受愚弄的时代,所以一旦转向意识形态,就吃亏了,因此要吸取教训。从那时以来,美国小说家喜欢将自己当作“个体市民”和“独立的企业家”。在他们之中肯定不存在为祖国服务的传统,不像欧洲或拉丁美洲的同行那样。作家的思想表达了美国个人主义的伟大神话。多克托罗以1940年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发表后在小说界、新闻界、读书界和各种研讨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为例说明:“不管一个作家采取什么立场,从形式主义到共产主义,他都需要采取某种立场,这是不可避免的。作家的命运就是面对他的思想意识去寻找他的位置,划清界线。”他还强调:这个过程是残酷而复杂的。世界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往前发展的。他指出:文学信仰就是各种文化的设想和观点,它们支配着我们作为作家生活的人。美国小说的某些严肃作品在某些方面成了美国神话的知识宝库。艺术作品是个性化的最高行为,也可以看做是社会的产物。也许作家们正在表述我们时代的一般危机,在一种屈服于政治环境和政治家们建立的规则下一面生活,一面写作。“为了开始重建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也许应该回到童年时代,回到过去,进入我们的梦,重新开始。”

这些论述清楚地说明了多克托罗文学创作的思想原则。

多克托罗反对否定欧美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坚持文学创作不能离开社会生活。他说过:

我从来都认为我的小说继承了狄更斯、雨果、德莱塞、杰克·伦敦等大师的社会小说的传统。这个传统深入外部世界,并不局限于反映个人生活,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力图表现一个社会。近年来,小说进入个人住家,关在门内,仿佛户外没有街道、公路和城镇。我则一直留在门外。

这说明他一直关注社会生活的变化,平民百姓心理情绪的高低,而不是闭门造车,在象牙之塔里表现自我。他还反复强调:作家的任

务是架设小说与历史之间的桥梁,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人们所说的小说与非小说之分,只有叙事体裁的存在。多克托罗的作品大都以他所熟悉的纽约市为背景,描写20世纪美国现代重要时期的历史变迁,尤其是欧洲移民的奋斗、社会冲突、政治事件造成的后果和城市生活的阴暗面。他以一个严肃作家的责任感,展示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他既继承了爱伦·坡和麦尔维尔的传统,又学习了前期后现代派的小说技巧。他像约瑟夫·海勒一样,对滥用权力十分反感;又像纳波柯夫一样,重视文字的简洁和流畅。

因此,多克托罗的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丰富的题材、深刻的透视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进一步充实了20世纪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犹太政治小说和新新闻体裁小说,为跨世纪的美国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仿佛告诉读者:后现代派小说的试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20世纪末现实主义的新变化。

在新千年里,美国文学正走向多元化并存的局面。随着新闻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政治神话的形成,实用主义思潮正在改变人们的价值观。通俗文化与严肃文化的界限逐渐消失。电影电视对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小说仍将是主要的文学体裁,但它日益成为电影电视的“软件”。多克托罗敏锐地意识到新思潮的到来,在40年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新路子。他的长篇小说打破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界限、小说与诗歌和戏剧的界限,将后现代派的艺术技巧与现实主义细节描写融为一体,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他的小说与电影“联姻”,充分体现了他既是小说家,又是剧作家的非凡才华。由此可见,他为长篇小说拓展了生存的空间,使它在信息时代注入新的活力。这也许将成为美国小说发展的新方向。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